

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论丛

共识的焦虑： 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 变迁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陈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共识的焦虑：

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变迁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陈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识的焦虑: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变迁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陈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论丛/罗以澄 主编)

ISBN 978-7-01-016495-3

I. ①共… II. ①陈…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1529号

共识的焦虑: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变迁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GONGSHI DE JIAOLÜ; ZHENG YIXING YITI

CHUANBO DE HUAYU BIANQIAN YU CHONGTUXING ZHISHI SHENGCHAN

陈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21

字数:330千字

ISBN 978-7-01-016495-3 定价:58.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 2014188）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项目
“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课题成果
《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研究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成员：

石义彬 罗以澄 吕尚彬 张金海
刘九洲 夏 琼 秦志希 陈 刚

主 编：

罗以澄

副主编：

吕尚彬

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研究丛书·序

自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之后，中国社会踏上了克服总体性社会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化、传播数字化、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轨道上，努力探求经济振兴、社会民主、文化繁荣、国民富裕、民族复兴的转型之路。中国传媒作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协同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自身也在转型发展。因此，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的互动互构、协同共进，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重要景观。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着力建构和谐社会并开始探索构建公民社会，中国传媒正在本体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轨道上，不断转型，持续刷新自己。所谓本体化，是讲中国传媒在政治与资本的博弈过程中，日益回归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这一传媒本体，尽管艰难，却竭尽全力地逼近社会事实真相，承担着社会生活的“探照灯”与“监视器”职责；所谓市场化，或者叫产业化，是讲中国传媒在“两分开”的基础上，正在不断演进成为市场主体；所谓数字化，是讲中国传媒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正在构筑新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并不断形成新的媒介样态；所谓国际化，是讲中国传媒在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既不断学习、吸纳发达国家传媒运行的新技术、新经验、新惯例、新思维，又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话语权。这样一些特点和走向，对于具体的传媒组织而言，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战略走向。探索和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媒转型的特点、规律和走向，这是当下研究中国媒介发展的核心议题和战略议题。因

此，在2008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承担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课题时，研究的聚焦点就自然集中在“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上。经过了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协同创新，课题组获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研究丛书》表述的就是这一重大课题的初步成果。

《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研究丛书》是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多个研究团队分工负责、联合攻关，才得以推出的一套丛书。整体而言，我们组织这套丛书注重创新性、前瞻性，兼顾实用性。

第一，创新性。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媒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球传播学者所关注的解析“中国案例”的一大战略性话题。这套丛书，便是学术界首推的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这一复杂性问题的学术专著系列。丛书的议题与观点均颇具新意。其中，既有对于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建构与新闻传媒发展一般关系的探究，又有基于协商的民意而对于转型社会的大众媒介与公共决策机制的分析；既有对于转型社会背景下网络与传统媒介新闻宣传的比较，也有对于媒介、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规划的深度分析；既有对于政府危机公关与大众媒介应对的洞察，也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传媒产业化发展问题与战略思路的探究，还有对于包括报业、广电、网络企业在内的中国十五大传媒集团产业发展的观察。

第二，前瞻性。整套丛书，重视对于中国传媒发展现实问题的捕捉、分析与解决，更注重中国传媒及新闻改革未来走向的探究与思考。这对于转型中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构建过程中充分发挥本体功能，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第三，实用性。丛书以理论与实践相一致为撰述的基本指导思想，既重视学理层面的探索与创新，又重视对于中国传媒发展实践的指导意义，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

这套丛书是集体合作、团队协作创新的结晶。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要向各部著作的作者及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你们的精心研究和创造性劳动才促成丛书的生成。我还要向人民出版社及本丛书的责任编辑陈寒节先

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正是有你们的杰出工作和鼎力支持，这套丛书才得以如此迅速地、精彩地问世。当然，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大端之谬，小节之失”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罗世

2013年1月28日

目 录

社会转型与传媒发展研究丛书·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社会新景观:转型社会的争议性议题	1
第二节 因为争议,所以传播:争议性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15
第三节 争议及相关议题研究的知识图谱	23
第四节 争议性议题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39
第二章 冲突与对话:作为社会冲突与话语事件的争议性议题	48
第一节 观点形成于交流:争议与共识	48
第二节 社会冲突与作为社会冲突的争议性议题	56
第三节 “引争议,最新闻”:作为新闻的争议性议题	67
第四节 解读与对话:话语与作为话语事件的争议性议题	75
第三章 建构与转向:转型社会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变迁	88
第一节 社会结构:案例选取的依据与分析逻辑	88
第二节 积极的国家主义修辞:“张华救人事件”传播的话语建构	94
第三节 精英话语的主导:“王海打假”传播的话语转向	120
第四章 狂欢与竞争:转型社会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变迁	143
第一节 大众话语的突围:“南京彭宇案”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消解	143
第二节 话语狂欢:“先跑教师事件”传播中的话语表达与社会参与	164
第三节 话语的竞争:“转基因争议”传播的话语秩序与知识生产	183

第五章 共识的焦虑: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冲突与叙事偏向	206
第一节 话语冲突:“转基因争议”传播与知识生产的焦虑	206
第二节 乳品安全议题传播与话语的结构性失衡	219
第三节 美国堕胎议题传播的叙事话语与共识幻象	232
第四节 共识的焦虑: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偏向与“去公共性”叙事	245
第六章 协商性共识: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叙事重构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258
第一节 与时代合音:转型社会争议性议题传播话语变迁的社会逻辑	258
第二节 协商性共识:争议性议题传播话语变迁的价值诉求	265
第三节 对话解释性叙事:争议性议题传播的话语叙事重构	278
第四节 从话语到知识:争议性议题传播与冲突性知识生产	290
第五节 知识化秩序:新媒体环境下争议性议题传播与知识联盟	299
结语	307
参考文献	309
后 记	326

第一章 导论

加拿大学者彼特·A. 克莱默 (Peter A. Cramer) 在《作为新闻话语的争议》(*Controversy as News Discourse*) 一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争议在哪里?” (where is controversy?) 并指出, 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方式, 争议 (controversy) 不只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话语之中, 更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 以各种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影响我们的生活, 吸引我们参与和对话, 争议的讨论离不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①

第一节 社会新景观：转型社会的争议性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生各种各样冲突的时代, 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冲突在媒体上日益上演与展开的时代和一个冲突媒介化 (mediatized) 时代。作为一个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常态 (social normal), 争议与冲突通常会出现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 几乎涉及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和理论视角对争议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相关成果颇丰的著名哲学家马塞洛·达斯卡尔 (Marcelo Dascal) 在其代表作《争议的传统》(*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 一书中, 从历史与文化的逻辑出发, 运用哲学的思维与知识路径, 考察了东西方国家中作为社会冲突

^① Peter A. Cramer, *Controversy as News Discourse*. Berlin: Springer, 2011, p. 7.

存在的争议的传统与文化基因。在与希腊的比较中，达斯卡尔指出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都是一个争议不断的社会，早期的争议更多地产生在政治（politics）和政策（policy）等方面，而随着文化历史的进化与演变，后期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渐进。^①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经济类十大争议事件”“文化领域十大争议事件”“体育类十大争议事件”以及“十大争议人物”等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年终的梳理和总结报道中，成为社会关注和聚焦的热点议题。与经济学、法律学等领域和专业意义上的纠纷争议（disputes）不同，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争议更多的是议题或某个事件在共识（consensus）或妥协（compromise）达成之前，持有不同意见的行动者之间经由话语而呈现的竞争或对抗的态势。

观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迎接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另一方面面临国内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上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碰撞，原有的常识和规范不断受到现实利益的挑战。社会的变迁与扩张带来的是整个社会谈论的对象和讨论的范围不断地扩大，这就是争议的时代。当代人生活在争议之中，制造争议、参与争议、围观争议、化解争议、娱乐争议、淡忘争议。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对冲突所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也许能给我们更好理解争议现象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她写到：“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取决于我们生活中的文明。如果文明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如果文明正处于剧烈的变化阶段，这期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存在，个人必须做出的决定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②同时，作为社会焦虑的一种释放方

^① Marcelo Dascal & Han-liang Chang, *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 Amsto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 9.

^② [美]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式,一方面,从现象上看,社会与公众参与社会争议的讨论,有利于增加对议题的认知和传播,推动问题解决甚至增加政策、法律改变的可能性,从而释放社会焦虑,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从深层次的层面看,社会转型期争议的产生、聚焦、传播与扩散,其实质更多地折射出转型社会中社会关系、文化、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等遭遇的挑战与困境,进而在社会心理上投射出社会与公众对事实、真相、公平等的期待,体现与反映的则是社会转型期从争议、冲突到社会共识形成过程中的焦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具体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生活层面,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最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是这一时期争议性议题的涌现,代表性的争议性议题主要有:“潘晓来信”(1980)、“张华救人事件”(1982)、“关广梅现象”(1987)、“王海打假”(1995)、“陕西省华南虎照事件”(2007)、上海闵行区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2009)、“转基因争议”等。除此之外,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死刑的存废”“食品安全”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具有争议的公共议题。这些事件和议题都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新闻媒体的激烈争论,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新景观。下面主要分三个阶段来具体梳理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代表性的争议性议题。

1. 意识形态主导下以论题式争议和争论为主的时期

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梳理与反思中,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节点,1978年及此后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起点。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任务:第一,思想解放,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三,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从此,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7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改革开放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都在或显或隐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无法以简单的话语概括，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中感受这些改革中国社会的力量。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思想路线。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国人却由劫后欣喜转向价值的迷茫。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是“迷惘徘徊困惑的一代”。^①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的信仰危机，试图在青年一代中重新树立崇高的理想。这就为青年中各种社会思潮和观念的涌现创造了客观条件。为解除“精神枷锁”而写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全国各地区也开始陆续转载这篇文章，一时间社会上对该观点赞同和反对意见皆有，形成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研究者形容这场大讨论“可以说是新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由民间发动的通过舆论力量迫使当时中央某些高层领导不得不接受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②。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翻“两个凡是”主张，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争议的开端。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陷入“空窗期”状态，处于“精神世界的荒原”。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体制提倡“螺丝钉”精神，个人只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要绝对服从国家大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与思想解放使得个体命运与个人价值得到极大关注，应该怎样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个

^① 曾燕波：《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与整合》，见《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8。

^② 京伍：《言论中国——观点交锋20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图 1-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光明日报》1978 年 5 月 11 日)

人与集体的关系成为讨论焦点。《中国青年》在 1980 年 5 月 11 日发表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信中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并发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

越窄”的惶惑，这正说出那个时代青年处于迷茫期时的心声。^①此后，全国千万青年被卷入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这场讨论标志着，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个人意识的觉醒，开始了对个体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寻和思考。

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和有机组成部分。从《光明日报》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关广梅现象”可以说是这场讨论的延续。邓小平在评价这场著名争论时说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②。尽管这场讨论试图解开紧绷的意识形态争论对实践的禁锢，但理论上的认识与理解尚不清晰。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观察到的那样，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③。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争议性议题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领域中“是”或“不是”的问题展开。从新闻媒体到整个社会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保持着高度兴奋和敏感，热衷于将改革之中出现的现象与人物放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框架中检验一番。这种对立框架一直是参与争论的各方定义、解释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极思维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口号的提出而失效，相反，这种思维固执地将经济、文化等领域争议的焦点引向意识形态领域，并为社会及新闻媒体的讨论预设下了两极对立的框架。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争议从改革开放持续到市场经济改革前夕，围绕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构成了这一时期争议的主要内容。尽管“改革”的口号一经呼出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从提出到接受，从宏观认知到微观

①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② 徐银山：《邓小平同志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观点》，《理论界》1994年第6期。

③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参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过程。从1982年的安徽“傻子瓜子”雇工现象之争、1987年“关广梅现象”租赁企业之争等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争议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是改革开放必须回应的一个重要的争议性议题。除上述提到的争议外,1982年发生的“张华救人事件”以及1988年关于纪录片《河殇》的讨论等具体的、产生过争议的其他领域的事件,也都被引向意识形态领域。此外,这一时期的争议在议题形式上更多地是以论题(thesis)的形式出现的,如真理标准问题、青年人的人生道路问题等,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性讨论,两极思维与对立框架的封闭式讨论占主流。

2. 市场经济主导下改革与社会转型语境中的多元化争议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根本性大方向的转变,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市场自主性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性增强,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1993年,我国再次修订宪法,肯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改革开放”第一次写进宪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年间,是中国将前一阶段大战略逐步精细化、具体化并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包括法律法规建设、市场经济规则制定、教育与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国际外交能力等问题。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正处于清华大学社会系李强教授所描述的“碎片化”状态和孙立平教授所言的“断裂”状态,表现为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社会治安情况呈现恶化趋势。^①这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利益群体尚未确定之时,思想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支持系统趋向弱化。市场经济改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给中国人的价值观带来了最真实的冲

^①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